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第三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举行
纽 约

主席: 古里拉希先生.....(纳米比亚)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猜耶南先生(泰国)主持会议。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1(续)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4/2)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谨对安全理事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大使简洁而又平衡地向大会介绍今年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向他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认为,大会审议这一报告将使本组织更多的会员国有机会思考和评价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态发展以及该报告所涉期间的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工作中的积极事态发展,反映安理会的透明度有所增加。这些积极事态发展包括主席定期地、有时每日举行由越来越多的非安理会成员参加的情况介绍和更为频繁地举行由非安理会成员参加的公开辩论和公开情况介绍。与此同时,安理会更愿意举行广泛的专题辩论,它拓宽了安全理事会应付对和平与安全的现有挑战的能力。这些辩论,除其它外,包括的项目涉及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向冲突局势中的难民和其他人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保护问题。毫无疑问,改进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提高了安理会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面前的信誉。

在安理会和安全理事会改革和结构调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都举行了关于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安理

会工作效率的严肃讨论。这些讨论的核心是促进安理会与安理会正在审议的特定问题有关的国家以及与其他有关方面的协商进程的重要性。显然,促进磋商有助于达到两个目的:从有关方面获得至关重要的信息以及向这些方面解释清楚安理会的看法和立场。这种对话和交流当然有助于改善安理会的决策进程。

我国代表团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已当选的安理会成员都坚信安理会有必要从有关方面直接获得信息,包括通过它们直接参与安理会的讨论来直接获得信息。我国代表团支持使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安理会的大量工作通过这一方式进行——向那些非安理会成员的有关国家的代表敞开大门的努力。有关方面的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非正式磋商,与“阿里亚办法”的更为非正式的安排形成对照,它将丰富安理会的磋商和决策进程。虽然它们不应该取代会员国和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磋商机制,后者自有其用途,但安理会成员和有关的非成员在非正式磋商中的这种会议将就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重要问题开辟一条联络和对话的直接渠道。

就“阿里亚办法”而言,我国代表团仍希望这一实用而有效的机制,根据其原有概念,专门用于促进安理会成员与个人、组织或机构就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在 1999 年 3 月 15 日致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按其一位前任的姓名命名的“阿里亚办法”的基本原理

和用途,据他说,该办法旨在用于得到

“个人、组织或机构的直接评价,它们……对促进更好地理解所审议局势的性质,会有所贡献”。

(A/53/865)

这清楚地显示,该办法的原定用途并不是在安理厅以外的一个会议室听取作为本组织的正式会员国的主权国家的意见。

除了使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进程敞开大门以外,我国代表团支持更为频繁利用所谓的安理会“非公开会议”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安理会在禁止旁听的正式届会期间在安理厅举行会议,与有关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均是有助于使安理会的磋商进程敞开大门的建设性建议。采纳这些建议不仅大为有助于使安理会对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来说变得更具有透明度和容易接近,而且大大有助于改善安理会在全力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复杂和挑战性的问题时决策进程。

我国代表团,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样,对安理会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瘫痪表示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失去了信誉和行动功效,将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为秘书长关切的问题,秘书长在本届大会开幕词中在人道主义干预这一有趣但又有争议的概念方面间接提到了这一问题。它引起了会员国的各种反应,而且必将成为今后几周和几个月进一步辩论的议题。我已经对这一概念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对它作深入的探讨。

不可否认,安理会中出现的僵局和瘫痪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其决策进程的一个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这是常任理事国手中威力最强大的一件武器。安理会面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科索沃悲剧无所作为,关键就在于此,而这些局势促使人们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显然,否决权问题需要由本组织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本身作出认真考虑,找到办法来加以约束,或至少更好地加以管理,只有这样,安理会才能有效发挥作用,避免今后出现更多的卢旺达和科索沃。

仅仅援引《宪章》权利来为否决权辩护是没有用的,因为《宪章》不仅规定了权利,而且规定了义务和责任。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创造性方式,按照时代的精神来管理否决权,而常任理事国出于其合理的自身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将支持这一方式。面对未来的

许多复杂挑战,要想避免安理会中出现无法控制的危机,必须作为当务之急来解决安理会的效率问题。

我国代表团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对制裁的使用。制裁虽然是《宪章》规定并得到公认的一种强制手段,是所有和平手段失败后的最后一招,但只应在认真分析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才实行制裁。这是为了确保制裁只对制裁对象产生预期效果,而不会影响整个人口。我国代表团支持安理会就有效执行和管理目前的制裁制度的方式和方法正在进行的讨论,它也将成为安理会今后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实行的制裁制度的有益方针。

我国代表团也极为关心全面制裁的削弱效应,例如对伊拉克实行的全面制裁已经对伊拉克平民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就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讨论该地区和平与安全这一重大问题以及波斯湾战争导致的其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时,我们曾几次申明,它们对减轻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负有极大责任。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听取受制裁影响的国家的申诉。我们鼓励制裁委员会主席只要有可能,即应访问目标国家,实地评估局势。我们还促请安理会在制裁已不再必要或法律有此要求时,即正式取消制裁,利比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如同所有威力强大的武器一样,在使用制裁时也应极为谨慎,以避免伤及无辜,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关于维和问题,本组织显然从过去的行动中获取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马来西亚作为部队派遣国,很高兴就我们参与的维和行动加强与安理会的定期相互作用。这有助于就人员的部署和有关问题作出更好的协调和决策。当然,几年来我们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维和费用的补偿迟迟得不到解决。除非在近期情况有所改观,否则,这必将影响发展中国家向今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部队的能力和意愿。

在安理会确定其适当使命后,维和特派团必须针对危机局势迅速建立。在这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安理会中的审议有时因狭隘和短期的预算方针而受到妨碍。这将在无意中削弱安理会的权威,往往还将削弱秘书长规划和执行此类行动的权威。它发出一个错误信息,似乎安理会对受影响的当事方漠不关心,而且有可能使人以为安理会在对不同冲突局势作出反应时是有选择的。在安理会审议在非洲的一系列维和行动时,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以消除这些想法。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中心和关键作用已明文载入《联合国宪章》。然而,安理会在开展其工作时,必须始终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以确保其决定在本组织更多会员国眼中的合法性,因为这些会员国并不参与安理会的审议。因此,我国代表团热烈赞扬本报告,因为它有助于加强对安理会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它还提供了一次从会员国那里得到至关重要的反馈的机会。由于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是一个连续的进程,我国代表团期望改进安理会向大会报告工作的方法,包括尽可能向大会提交《宪章》规定的特别报告。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向新近当选的安理会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它们将于明年就职,我们期待与它们在安理会中进行密切合作。

哈查尼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大会再次审议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和第十五条第一款提交的报告。我们要就这份报告向安理会及其主席表示感谢。

在我们审议安全理事会去年的报告期间,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意到其中所作的改进,尤其是报告中列入了包括制裁委员会在内的安理会附属机构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关于文件编制、制裁委员会和安理会工作方法的信息。我国代表团还表示欣赏安理会采取的新作法,即作为补编,印发安理会前主席对安理会工作的简要总结。这些即使不代表安理会的看法,至少提供了关于安理会工作、尤其是关于非正式会议以及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的补充信息。会员国现在对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有了某种程度的更清楚的理解。

尽管报告有这些改进,但我们认为,报告整体上仍然缺乏分析或信息,在向非安理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的非正式审议和磋商方面,情况尤其如此。我国认为,报告要想成为联合国两大机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积极相互作用的一个真正手段,应对安理会工作中关注的所有项目作出更多分析,以体现它所追求的公开性。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继续考虑采取何种方法来改进其工作方法和程序,包括提交《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所提到的特别报告。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我们在 2000 年 1 月开始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时,将在安理会中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我国代表团还希望,关于安理

会成员数目增加和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大会工作组尽快圆满结束工作,以增加安理会的代表性。

审查一下报告便可发现,非洲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占据突出位置,特别是对秘书长报告的讨论集中在非洲冲突的起因和安理会关于某些非洲国家局势的工作。我们强调要高度重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之间进行协调以加强非洲的维和能力。

安理会最新报告还突出了当前维和行动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联合国的维和能力。这一工作包括执行联合国待命部队安排。我国有幸于 1999 年 6 月加入这一安排,提供了资源供联合国使用。

关于那些不与个别国家或冲突有联系的问题,例如人道主义、问题冲突期间保护平民、保护儿童和国际恐怖主义等等,我国代表团强调,维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相互作用性对话以及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的职责范围和特权十分重要。

最后我要简要提及安全理事会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手段实行制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重申我们高度重视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我们认为在实行制裁时应该时刻考虑的某些界限:制裁应该作为最后手段;制裁的范围和期限应该有限;应该减轻制裁对平民造成的影响;最后,应该根据《宪章》第 50 条考虑到第三国的利益。

卡斯特罗普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第 54 次提出年度报告。这份全面的长文件证明安全理事会在所涉期间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报告反映了巨大的工作量,与前一年相比又有增加。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承担了履行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它们的责任的重任,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和感谢。还应指出,安全理事会的确是代表我们所有会员国履行这些职责的。

统计数字表明,闭门开会的倾向仍在继续。非正式磋商的次数几乎比公开会议多出一倍。我们认为,这一发展值得密切注意。安全理事会有可以理解的原因需要经常以秘密的方式开会,以便能够进行深入的实质性讨论。我还要特别提及,安全理事会成员是愿意与非成员国合作并向其提供信息的。

但是,存在着如何在具体磋商之前让有关方参与和如何使与问题有重大牵连的第三方参加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我要提及安理会关于

文件和其它程序问题工作组的令人敬佩的工作。应该鼓励并继续为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进行的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帮助了目前关于安理会改革问题的第二组的审议。

这就提出了一些显然困难的问题。例如: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程序以考虑当事方了解情况的需要以及安全理事会秘密开会的偶而需要,哪种程序比较灵活,能够在具体情况下采用但看来又不是武断的?然而,只能从程序或法律角度考虑参与的问题。安理会审议的基础越广泛,即有更多的因为有正当理由或重大利益需要陈述意见的国家参加审议,安理会的决定和决议在一个冲突日益增加的世界上的民主合法性就越牢固。

安理会应切实考虑更加透明的程序,只要有可能,就应确定一种更公开的形式。重要的是,不应改变或修订《宪章》的任何条款。我们都很清楚,安全理事会是本身程序的主人。这意味着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政治意愿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并不包括文件和统计数字。由于技术的原因,含有统计数字和文件的参考书很可能有用。这是一个安全理事会向大会解释的问题。

然而,仅仅提交一份有关安理会活动的勤勉和耗力巨大的报告是不够的。遗憾的是,没有提到安全理事会正在面临的挑战,更不用说它在应付挑战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世界上的危机和冲突并没有减少,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尤其描述了仍然存在安全理事会而且尚未找到圆满答案与办法的许多问题。

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 1 款,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

各会员国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与安全理事会。请允许我提问: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目前的组成与工作方法,它是否能完成这一任务?

从许多角度而言,科索沃冲突代表了一个转折点。我不想试图为人道主义干预的中心问题增加新的论点。秘书长在其对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头脑清醒地谈到了国家主权与人权普遍适用性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是,为了在未来避免科索沃式的干预,我们必须最终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拖延已久的重大改革。安理会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尤其是它必须有足够的能力真正代

表联合国会员国,以合法的方式对今天的危机和冲突作出反应。

我想回顾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在本届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在讲话中提出的非常具体的见解。关于安理会他谈到:

“改革必须包括扩大安理会,纳入更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同时并加强其决策权力……”

“在改革的辩论中,我们不能回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的问题,这是安全理事会行动的一个关键问题。”

“……要求一个国家承担其义务,向大会解释与否决决议草案的原因,会使上述情况难以发生从而使有责任的行使否决权方面有很大进步。大会今后为什么不能也承担更大的责任呢?”(A/54/PV.8,第 10 页)

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改革,安理会及其行动的合法性具有被削弱的危险。

我们所希望是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重大、意义长远和具有远见的改革,以便应付下个世纪的各种难题。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希望感谢安理会主席、谢尔益·拉夫罗夫大使简要地介绍了安理会给大会的报告。我们作为安理会的现任理事国,认为应继续努力,以确保对报告的审议。它应是安理会加强透明性和责任制的基础。在这方面,而且牢记安全理事会程序和工作方法的讨论,巴西赞成采用使安全理事会工作更接近一般会员国的作法,更经常举行非公开会议也许是一个进步,然而,目前工作组正在审议其他建设性的意见。

我借此机会向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国祝贺:孟加拉国、牙买加、马里、突尼斯和乌克兰。我国代表团相信,它们不会辜负选举它们的广大会员国的期望,因此将努力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今年又是安全理事会非常忙碌的一年。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值得高兴的原因。相反,这雄辩地证明,国际社会还没有建立《宪章》的制定者们所设想的、和平、稳定、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千年的结束并没有随之带来种族灭绝的结束。大规模屠杀、被迫流离失所、普

遍破坏和劫掠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在不断提醒我们 20 世纪悲惨黑暗的一面。

1998 年 6 月到 1999 年 6 月,我们在几乎每个大陆都目睹了冲突局势的暴发、维持或恶化。有效处理国内冲突的国际后果的挑战一直列入安全理事会每日的议程上。在非洲出现新的危机时,长期的冲突—例如已在安哥拉为时 24 年的内战—仍在持续。非洲大陆冲突的持久性和复杂性值得安全理事会给予紧急和连续的重视。

巴尔干的稳定尚未实现。科索沃的局势是国际社会面临的艰难挑战。中东仍是一个需要严重关注的地区。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方面,安理会仍没有发挥作用。亚洲仍生活在核试验的阴影之下,最近还面对着东帝汶暴力行为的加剧。在这一混乱局面之中,2 千 1 百多万人—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认为需要得到“关注”的人—毫无希望到处流浪他们的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令人绝望的真实的一面。

尽管总的局面令人担忧,安全理事会还是能够在其职责范围内处理了某些问题。我们希望强调最近的发展:在中非共和国最近以公平和有秩序的方式举行了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几内亚比绍正在筹备定于 11 月 28 日举行的选举;很快将在塞拉利昂布置一支维和部队,帮助巩固和平进程;在卢萨卡停火协定签订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前景已得到改善。

安全理事会还在准备参与使东帝汶向独立过渡的复杂任务。不应低估东帝汶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的重要性,巴西密切注视着东帝汶的局势,我们与东帝汶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遗产。东帝汶未来的情况将证明国际社会可在《宪章》的框架内采取许多种类的行动—当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情况提供了机会时,秘书长发挥了领导才能;安全理事会在这一进程的所有阶段提供全面支持;利用各种外交手段、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特派团这一具有创新性的作法;承认在那一特殊情况下“意愿联盟”是最好的选择;安全理事会向多国部队授权;提议向完全意义上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过渡,对此我们都希望将尽快实现。《联合国宪章》为所有这些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宪章》的充分潜力仍然有待探索。

《联合国宪章》所提供的很多渠道的另一个很好例子是海地。我们去年在同一个项目下所做的发言中提到,海地是安理会议程上涉及本区域国家的唯一剩余项目。我们今天高兴地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这样说。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12(1998)号决议的条款,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在其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议上审议了海地问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11 号决议请秘书长为海地制订一项长期战略和支助方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海地问题把冲突后建设和平行行动的重点集中于构成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政治危机根源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从而开创了一个有用的先例。

我们的审议所涉期间,我们还看到,在涉及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时,有的国家曾多次越过安全理事会的权威行事。秘书长本人在纪念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100 周年时在海牙讲话时指出,存在着安全理事会不参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努力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趋势。巴西对在没有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下决定实施行动的所有情况感到遗憾。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国际法的基础就受到动摇。《联合国宪章》所提供的合法性如果被弃之不顾,就会出现强权胜过公理的不稳定秩序。

在我们看二十世纪的光明一面时,我们看到人们日益趋向认同一些根本性的价值观念的迹象。宽容、民族、人道主义原则、人权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争取实现一个其稳定是以正义而不是武力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的愿望的核心。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将这种道德基础化为能够作为国际社会的基础而行动的机构。同样,如此相反的道路是让位于作为社会的主要聚集力的从事战争的潜力。

莫纳加斯-莱瑟尔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发言): 我国代表团感谢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作为安理会 10 月份主席介绍 1998 年 6 月至 1999 年 6 月期间的安全理事会报告。

委内瑞拉极感兴趣的关注着安全理事会在行使责任方面的实质性工作,以及它在其程序和活动的透明度方面的工作的进展。

关于它的实质性工作,委内瑞拉重申支持安全理事会作为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机构。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审议中的一年期间所完成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使本组织能够始终不断的监测很多冲突局势并利用它的预防、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能力。

从维持国际和平行动的数量及其复杂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还突出表明需要扩大关于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和改革安理会的讨论的范围。安理会正在越来越多的作出具有约束性的宣布和决定,我们也看到安理会在同样的程度上比过去更需要通过会员国参加安理会来加强其合法性,而这是符合本组织的新现实的。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日益关心与那些其严重程度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注意的有关武装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对为难民提供援助的人的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以及恐怖主义行动的威胁。联合国应要求制订与这些问题有关的预防措施。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般和稳定解决办法时,安理会能够而且必须得到大会的协助。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本身,委内瑞拉支持过去一年中出现的局势,即区域组织根据《宪章》第八章进行更多的合作。对于秘书长在他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对在一些情况下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并将其责任向下分配,从而造成一种只会削弱集体安全制度的法律基础的先例表示关切,我们也不能不感到同样的关切。但同时,我们也想确认,我们很重视安理会不断审查局势,直到取得预期结果和和平得到恢复。

关于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委内瑞拉正在以更大的兴趣关注着在工作方法方面所作的改进。我们特别支持与部队派遣国进行协商的作法、由主席提供的口头报告以及就普遍关心的问题举行公开会议。我们特别赞扬在我们面前的报告所涉期间充分地处理非洲的冲突局势。

我们希望将得到进一步处理的一个特别相关的问题是附属机构,特别是制裁委员会的工作的透明度和报告。我们相信,在这方面可以作出改进,以便客观评价现有制裁制度的范围和后果。

最后,我想重申大会的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重要性。我们呼吁安理会继续努力改进其工作的透明度和工作方法,包括在它如何向大会提出它的报告方面进行改进。

李亨哲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鉴于安全理事会正在面临日益增加的新挑战以及本届会议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届,我们认为,非常适当的是抓住这一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议程项目进行审议的机会,来根据《联合国宪章》全面审查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活动的各个方面。

让我现在对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表达一些看法。

如去年一样,我们当然注意到在报告的格式方面所作的一切改进,例如根据安全理事会在 1997 年 6 月同意的措施在报告中包括对每一次全体非正式协商的简要描述和各位前主席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每月评价。我们特别注意到以报告增编的形式继续在报告中包括

每月的评价。这种增编的内容虽然是有限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报告的质量,从而帮助会员国马上了解安全理事会在审查期间的活动。

尽管有这些改进,但我们遗憾地说,报告仍然是程序性的。例如,安全理事会活动的 80%是通过非正式协商进行的。因此,合乎逻辑的作法将是在报告中包括关于全体非正式协商的详细和分析性资料。

然而,本报告对非正式协商的描述只包括关于那些磋商的日期和记录的一两段。没有关于审议过程的资料,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对安理会中所辩论的具体问题的看法。

因为非正式磋商的概念无论在《联合国宪章》或在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中都没有具体说明,这个过程继续不能被看作是正常的。此外,将有关方面排除在非正式磋商外以及不详细描述磋商的具体内容违反了多数会员国关于确保安全理事会活动的透明度的要求。

象我们迄今为止的辩论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为确保安全理事会活动的透明度,最重要的事是安全理事会公开讨论所有实质性问题,并同时将其非正式磋商限于程序性问题。

此外,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31 和 32 条邀请有关各方参加非正式磋商,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以使他们的看法能够适当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的审议过程中。

让我也谈及安全理事会在即将进入新的千年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虽然自从安全理事会开始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工作以来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继续坚持采取无视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中的宗旨和原则的行动并违反其任务。

1950 年,在联合国成立最初几年中,存在着某种武断作风,这导致在并非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出席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通过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那些行动所产生的遗留影响仍然被人用来利用联合国。

最近几年中,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世界看到了其他武断行动,例如在没有安全理事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甚至越过联合国对主权国家使用武力。

在使用武力时越过联合国是对《联合国宪章》和普遍承认的国际法的严重违犯,因为这几乎等于放弃予

权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承诺以及尊重会员国主权的承诺。

如果在各国关系中无视尊重主权的原则,就不可避免地而努力保护其主权的国家和试图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势力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抗,其结果是,这个世界将永远不会稳定。

为使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建立一个人类所追求的和平世界作出贡献,首先应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中所规定的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等互利原则。

主权是每一个国家的生命线。不干预他国内政和平等互利是绝不应以任何理由违反的根本原则。

第二,安全理事会不应采取可能侵犯会员国主权的措施。不应允许对各国主权的侵犯和对各国内政的干预。

第三,为使安全理事会决议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应建立一个制度使大会有权批准关于诸如使用武力和经济制裁之类的关键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最后,安全理事会应审查在过去通过的所有决议的实施情况并消除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决议,为此目的应采取有勇气的步骤以纠正那些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不符合当今现实的决议。

在这方面,我借此机会提请所有与会者,驻在朝鲜的大约 4 万美军利用联合国的旗帜和头徽冒充联合国部队。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将于明年举行的千年大会和首脑会议期间将对有关安全理事会活动的建设性建议给予认真考虑。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让我首先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俄罗斯联邦的拉夫罗夫大使的祝贺,他作为安全理事会十月份主席根据《宪章》第 24 条第 3 项向我们提交了安理会的年度报告。

我想借此机会对安理会成员提出这个高质量、很有现实意义和平衡的报告表示敬意,这个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和努力追求,而这是安全理事会负有首要责任的领域。

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全世界的很多动乱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经常威胁,安理会又经历了繁忙的一年。该报告代表着安理会成员和秘书处所作

出的努力的总和,它也是使安理会工作更公开和更有透明度方面的一个重要阶段。

最近几年在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更大透明度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赞赏向安理会非理事国提供资料的这种已经固定下来的作法。我国代表团欢迎就安理会议程上的各种项目举行公开辩论,以及安理会主席为组织关于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具体问题的公开会议而采取的行动。

每一位主席都在他任职的一个月期间努力就一个重要主题组织一次辩论。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创新作法,我们只能非常强烈地支持这个趋势。

因此,会员国能就各种重要问题表达它们的意见,如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保护对受冲突局势影响的难民和其他人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持和平与安全和冲突后缔造和平;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儿童兵问题;以及流离失所者问题。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还把震撼非洲的各种危机放在突出地位,其中包括安哥拉危机、布隆迪危机、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危机、刚果民主共和国危机、中非共和国危机、几内亚比绍危机、塞拉利昂危机和索马里危机。目前在安理会的议程上,非洲大陆的危机最多。

自从 1998 年 4 月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的报告发表以来,非洲大陆的不稳定促使安理会多次召开会议审议震撼非洲的各种危机,以及为审议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而设立的特设工作组的建议。该工作组由加蓬大使领导,已经向安全理事会递交了其结论,被安理会在 1998 年 9 月和 11 月期间以决议和主席声明的形式一致通过。

在这些不同的决定中,安全理事会确定了保证和保护和平的原则,并为此提出了若干不同的手段和机制,如武器禁运,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有关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合作,难民营的安全,非法武器贩运,以及通过区域组织加强和平。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为控制这些冲突所作的努力,因为没有和平,就不能有非洲发展。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象非洲领导人在这一讲台上反复强调的那样,牢记非洲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动听的宣言和决议。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将根据具体、积极的行动来衡量。

在几场非洲危机中,安全理事会的犹豫和经常未采取行动,已导致非洲国家的极大挫折,为了非洲大陆的和

平与发展,安全理事会首先应该支持非洲人加强他们维持和平能力的努力,以使它们能够对付这种危机局势。

我还注意到,安理会成员往往倾向于让局势恶化,直到造成重大生命损失,而且常常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在科索沃和东帝汶的教训之后,安理会某些成员说他们现在将重视非洲问题。但是,这将根据他们预见非洲不幸事件和采取适当预防行动的能力来衡量。安全理事会成员往往对危机反应过迟,而面对非洲的悲剧局势,他们应该迅速行动,以免为时过晚。我们甚至看到,同非洲以外发生的同样的人道主义局势相比,对非洲局势的反应往往严重拖延,以致于我们怀疑,非洲人民有难时,他们的待遇是否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不等。

为了防止因安全理事会面对这种局势不能行动而严重损害该中心机构的信誉和权威的严重后果,必须改善安理会运作的方式。这方面,我要强调并欢迎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已经存在的广泛共识,其中包括非理事国参加安理会会议、安理会的工作安排,以及由安理会主席为非理事国和部队派遣国安排情况介绍。

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通过制度化的办法把这一动力变成真正的进展,以便一个振兴、更加有效和更加透明的安全理事会能在下一世纪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制止那种撇开安全理事会的可悲倾向。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已在未经安理会授权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者以人道主义干预权利的名义采取单方面行动,区域组织在冲突预防和维持和平方面所能提供的帮助,决不能解除安理会对促进和平与集体安全的最大责任。

因此,我们必须阻止这种局势,强调《宪章》所规定的职权范围,以便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们能有一个适应我们变化中世界的安理会,一个尊重国家主权,并能在全世界保护人权与维护和平中显示出想象力和决心的安理会。

奥尼亚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确实荣幸地重复我国总统上月份在大会讲话时对大会主席士里拉布先生非常热烈的祝贺。古里拉布先生的杰出领导已经体现在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审议中,尼日利亚代表团保证对他继续支持。

我们感谢安理会新任主席、俄罗斯联邦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今天上午介绍报告。也让我表示,我们感谢秘书处的努力,编制这份全面的报告。

这一议程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充分机会审查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理事会这一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主要机构的许多活动。本次辩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本世纪就这一问题进行的最后一次审议。的确,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应得到我们的特殊关注。

我要赞扬安全理事会在解决世界各地冲突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非洲,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对纳米比亚的独立、南非成功地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结束莫桑比克的冲突和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b在利比里亚缔造和平的努力都极为重要。虽然取得了这些重要的成就,仍有一些其他领域需要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困扰某些非洲国家的冲突中显示出更大的承诺和坚决果断,正如在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

正如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的原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319)明确指出的那样,非洲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多种多样和复杂的。我们大陆当代冲突局势揭示,它们起因于与社会中贫穷和经济-社会不平衡有关的多种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局势的部长级会议表示欢迎。从这些会议可以清楚地看到,持久地解决非洲的冲突局势需要有深远的主动行动和解决方案,它们一方面涉及和平、安全、善政、尊重人权和法治,另一方面涉及可持续发展。

西非经共体在恢复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和平中所起的作用显示了一个分区域组织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西非经共体监测组的成功确认,这种区域主动行动,只要存在,便有成功的良好机会,只要它们的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努力获得安全理事会适当和及时的支持。但这种成功是在本分区域国家,尤其是我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取得的。我们的经验加深了我们的信念:西非经共体已经形成了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独特机制。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应付世界各地所爆发的冲突缺乏统一的标准。安全理事会对我们大陆所爆发的冲突的反应一直颇为缓慢,而在准时作出反应的地方,它却没有作出适当承诺,即没有授权采取措施和拿出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将解决非洲的冲突与解决其他地区的冲突放在同样重要

的位置,因为不采取行动的后果是极其灾难性的,正如卢旺达的情况所充分显示的那样。

新千年来临之际,联合国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民主化。在这一方面,我重申需要紧迫地对安理会及其工作方式改革,以增加安理会的透明度、合法性和功效。尼日利亚始终坚持认为:目前非洲有 53 个联合国会员国,但它竟没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种情况是难以接受的。此外,这种改革必须产生的结果是,不仅加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增加其功效。

尽管非洲的冲突的确产生于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条件,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只要非洲未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只要非洲人民仍然受到贫穷、疾病和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的蹂躏,真正的和平与安全仍然是非洲大陆的梦想。因此,尼日利亚敦促联合国在其计划中采取一种更为整体性的战略,促进冲突预防和管理,并确保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来说,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那些当选为 2000-2001 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即孟加拉国、牙买加、马里、突尼斯和乌克兰。

最后,我愿重申尼日利亚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承诺,并向大会保证:我国将不遗余力地寻求全球和平与安全。

特洛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愿对 10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谢尔盖·V·拉夫罗夫大使就安理会提交大会的报告所作的介绍向他表示感谢。令我国代表团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若干年前由巴西开始的试验现在已经成为大会审议这一议程项目开始时的正常惯例。

现在放在大会面前的 1998 年 6 月 16 日至 1999 年 6 月 15 日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载有一份安理会正式活动的年表和报告期间通过的决议和发表的主席声明的汇编。它已成为图书管理员和档案保管员的宝贵工具。它简明有序地载有报告期间的文献、决议、声明和安理会审议的议程项目的参考资料。

尽管每年的报告都有所改进,但我国代表团认为,报告中的信息若欲完全履行安理会就其活动向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递交一份完整和适当的报告义务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要再次重申,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一份汇编和一项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说明,倒不如说对安理会审议期间所发生情况的分析和对其作出决定背后的推理的解释。这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它是安理会向大会报告义务的组成部分。

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48 条明确指出,除非另有决定,安理会应公开举行会议。但惯例却将该规则的例外情况变成了一般做法。安理会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关起门来进行非正式磋商,这决不是暂行议事规则所预想的。

在我们面前的报告所涉期间,总计举行的 360 次会议中,只有 121 次是公开会议,而两倍于此的 239 次会议是非公开举行的。公开会议是我们不属安全理事会成员的 173 个国家在这一机构中发出声音的唯一机会,而这个机构按照《宪章》本身,是代表我们所有国家行事的。非公开的、非正式的磋商,本该用于处理程序问题,现在却成了安理会进行具体的实质性工作的场所。因此,让人费解的是,对这些非公开会议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而根据报告本身,这类会议占用了安理会大约 511 个工作日。

按照《宪章》,大会必须了解安理会为辩论和制订决定而进行磋商的实质内容。这些决定随后必须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接受和执行,是它们委托该机构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是从我这里得到授权,因此它必须对我们作出回应。问责制的程序是任何所谓民主的程序的一部分。

报告在科索沃一事上的沉默很能说明问题。这场冲突在今年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们都知道在安理会的公开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些因素导致安理会在冲突的处理上完全处于边缘地位。实质性审议不仅是在幕后进行,而且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仅限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圈子。我国代表团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报告没有作出任何分析,安理会为什么要让位于一个军事联盟,在其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常任理事国属于这一联盟,这一行动并不符合《宪章》第八章的规定。

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成员公开进行其实质性工作。这不能算是它们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慷慨让步,这是一个不仅信守其自己的规则,而且信守合法性规定的道德要求的问题。

我们不想在这里分析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也不想谈论安理会一些成员享有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特权问题。这个问题正在由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审议。我们只想指出,安理会内缺乏透明度和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使安理会成为世界强权角逐场面的政治上正确的观察者,而不是寻求解决国际冲突的倡导者和斗士。

如《宪章》第二十四条所表明,安全理事会是“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的一个机构。它的权力主要是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的责任包括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冲突局势的恶化。如果以国家体制来打比方,安全理事会即相当于某种执行机构。

安全理事会不是一个审议性的机构,它没有权力颁布普遍适用的规范性的规定。这是大会的职责。大会属于国际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其广泛的职能如《宪章》第十条所规定,允许它“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按第十一条规定,大会“得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合作之普遍原则”或“讨论……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问题”。实际上,它可以讨论第十三条规定的任何其他问题。如果在大会职能范围内需要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随之才将插手。

责任的划分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将安全理事会比作一个权力有限的执行机构,也即一个立足行动的机构,那么大会就是立法机构,一个审议和制订普遍规范的机构。

近些年来,安理会成了一个审议普遍关注的一般性问题的机构,它试图使其本身的行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我国代表团对这一趋势表示忧虑。我们应当尊重联合国主要机构各自的职能。应当由大会来审议当代问题,并制订规范和原则。而安全理事会则应在危机情况下,尤其是针对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墨西哥代表团重申,了解情况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权利,并非如某些人所相信的,只是一种特权。安全理事会成员有义务让其他国家充分了解安理会所审议的问题,以及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的理由。我们请安理会、尤其是其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入走向公开性、透明度和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我国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全力投入这一进程。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加拿大欢迎有机会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道讨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安理会与向其负责的国家之间对话的机会极少。加拿大

认为,作为安理会选举成员,这种责任看来是很明显的。我们在竞选时支持过这种责任,我们目前在安理会正在促进责任和负责概念的实施。我们一向的立场不仅是建立在更加公开、透明和负责的安理会的内在价值上,而且建立在有效性的实际考虑上。安理会只会从与那些最终必须实施其决定的那些国家加强互动中得到好处。

我们面前报告的篇幅充分说明安理会开展了空前多的活动。但安理会正在处理的安全问题之多表明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安理会的令人欢迎的积极性,尽管要处理的安全问题多也说明世界的冲突很多。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就交叉出现的安全问题举行了众多主题辩论。加拿大很高兴能够提出关于保护冲突局势中平民问题的倡议,从而为这一趋势作出了贡献。这些倡议使安理会能够以比安理会通常危机模式允许的更广阔的角度和更全面的方式审议重要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此外,这些倡议帮助安理会转向一种更广泛的安全定义。报告还记录了安理会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例如暂停对利比亚的制裁和授权联合国在东帝汶和科索沃部署新特派团。

但是,使我们惊讶的是 400 多页的报告所没有列入的。安理会今年没有着手解决一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令人深感关切。由于五个常任理事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使其行动受阻的那些危机,例如科索沃危机,以及存在深刻分歧的问题,例如伊拉克,影响了安理会的有效性。必须从集体利益出发克服政治和政策分歧;威胁使用或使用否决权必须让位于更加大力谋求协商一致。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让财政考虑驱使或主宰就是否和如何对不利于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危险作出决策的那种顽固倾向。这种态度常常影响决断,导致依赖其它方面——常常是最没有偿付能力的方面——执行安理会有时是未能圆满表达的意愿。决不能让安全理事会维和方面令人自豪的传统由于财政拮据、官僚主义的无能或停摆而黯然失色。

(**以英语发言**)

我们还应从我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分辨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经安理会授权建立的为多国部队筹措资金、代替通过公认的分摊办法支持的联合国维和团的信托基金根本无法奏效。最近,这些基金对在塞拉利昂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未能奏效,对东帝汶

的国际部队也未奏效。在塞拉利昂,只有 200 万美元存入信托基金,这一数目无法维持西非监测组 3 天的活动。鉴于这种记录,没有理由期望信托基金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任何其它地方奏效。

显然,日本对东帝汶信托基金的 1 亿美元的慷慨捐赠是重要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但即使这样的捐赠也只能对支付这一重要维和行动的巨大开支起到很小的作用。部队派遣国必须支付大部分开支,而这并不是个办法。西非监测组在塞拉利昂作了杰出而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遭受大量的伤亡,在很少有国家愿意的情况下挺身独赴危难,从而使该国有了某种程度的稳定。重要部队派遣国和出资者尼日利亚表示它已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但是,我们将向塞拉利昂派遣一支混合部队,在这支部队中,西非监测组部分的资金仍由募捐解决,而我们国际社会将再次无法完成这一募捐。

世界几乎各个国家面临的政府资金限制和拮据的现实使任何规模的维和行动的巨额开支都不能通过自愿捐助加以解决。我们各国政府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联合国宪章》赋予的义务,根据商定的会费分摊比例表正式缴纳维和开支。他们没有——我敢说他们不会投票赞成将任何相当数量的资金拨给不是联合国指挥和授权的维持和平特派团——换句话说——不是传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作为财政部长们所说的“酌用性”开支。毕竟,这是集体安全的核心所在。

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根本性中心职责,不能也不应推卸或分配给愿意承担这种重大财力和人力义务的国家、区域联合体或临时性集团。当然,区域组织和主要区域角色将继续在许多维和行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普遍的联合国授权的目标只要能够实现,就对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原则至关重要,并应该继续是我们处理所有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维持或恢复和平的局势时所奉行的目标。

由于秘书长今年大会开始时提出了颇有洞见和在我们加拿大看来非常令人欢迎的报告,会员国之间在联合国履行其和平与安全使命时就联合国总的任务和职责、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和职责有关的根本性问题开展了对话。秘书长成功地把集体安全方面最近的一些失败的事实和有关未来的富有挑战的看法联系起来。这一看法将人类安全放在我们工作的中心,加拿大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主要挑战是详细勾划何时和如何进行干预以便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的各种细节,这是联合国必须随时准备面对的挑战。

关于安理会,加拿大认为,在安全理事会考虑何时和如何采取行动时,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权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不仅因为它们对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具有直接影响,而且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就使得它们成为应予执行的标准。必须是在实践中对国家主权和人的安全的原则加以更迅速的协调。正如目前事件所表明,不能这样做就有降低安全理事会在应付今天的冲突中的作用的危险。

在努力制订安全的这一新定义的同时,必须更新工作方法,加强透明性和减少秘密性。加拿大和其他当选理事国已尽自己的努力,公开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供更广泛的审查,途径是定期向感兴趣的非理事国介绍情况,并在加拿大任主席期间在我们常驻团的网址上提供大量有关安理会活动的信息。

为加强安理会的有效性,我们认为,当非理事国的存在可以对安理会预防和控制冲突的努力作出有益贡献时,应有更多余地使非理事国参与安理会的审议,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审议。我们认为安理会应举行更多公开会议。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更有想象力和更有创新性的利用大大超出“阿利亚办法”的其他方式,以便在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之前使非理事国有更多的参与,并更了解情况的发展意见。安理会的决定和程序必须加强对和平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强国的特权。我们希望,明年的报告和在此之后的报告将反映在这些方面的进步。

我们希望与安全理事会新当选的理事国密切合作,它们将给我们的审议带来新的见解和全新的角度。当然,我们将怀念离任的 5 个理事国,从今年年初我们和他们共事以来,他们就慷慨的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明智的意见。要使今天如此之多的发言者提议的各种变革成为安理会的工作的方式,两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然而,除非推动变革的压力能够从一组当选理事国持续到下一组当选理事国,否则这种变革将仍是不能实现的。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希望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俄罗斯联邦的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对今年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所做的有说服力和客观的介绍。的确,纳米比亚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认为这个实行了 7 年的做法非常重要。

报告表明,在审查期间,有很多时间专用于处理非洲问题。然而,非洲继续受到越来越多紧急问题的困扰,这需要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一直支持旨在解决该大陆冲突的区域努力。然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应只是非洲人的责任。若要保持安全理事会的信誉,这一国际机构就必须承担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将它委托给任何分区域和区域集团。

在冲突结束后的时期里,重要的是开始采取冲突后建设和平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强调预防和尽量缩小冲突的再次出现。

非洲决心促进在解决该大陆陷入的各种冲突中使用和平的途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对我们大陆来说是一个宝贵的财产,必须得到扶持、支持和加强。该机制象征着我们大陆充分承担自己责任的具体决心。为此目的,非统组织将需要联合国会员国的全面合作。

例如,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1234(1999) 和 1258(1999)号决议,因而在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期望在该国全面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促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停火协定。

安全理事会即将通过的在塞拉利昂部署 6000 军事人员的决议,将稳定该国局势,为和平提供一个机会。我们期望迅速部署这一维和行动。非洲的其他局势也应得到同样处理。

秘书长在努力解决非洲问题方面并未动摇。此外,去年安全理事会就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举行了两年期部长级会议,在这次会议和其后的会议上,通过了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我们诚挚地希望,秘书处、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将执行这些决议和声明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平民在武装冲突中的困境,尤其是儿童在武装冲突中的困境,已得到安全理事会的适当审议。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些沉默的社会成员所遭受的苦难已得到承认,而且安全理事会和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继续努力解决他们的困境。

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问题对安理会的效力、信誉和权威至关重要。尽管在加强安理会工作的透明性和易接近性方面已取得某些进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透明性不会妨碍安理会的工作;只会加强它的各项活动。

纳米比亚对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立场中明确的。我们赞成扩大安全理事会,以反映联合国会员国大

大增加这一现实。到今年 9 月为止,会员国已达 188 个。

我们欢迎马里和突尼斯最近当选为安理会理事国,并希望感谢冈比亚和加蓬对安理会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样,我们希望同孟加拉国、牙买加和乌克兰一起努力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职责。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能够就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4/2)而向联合国成员国发言,是一种荣幸,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俄罗斯联邦的拉夫罗夫大使介绍该报告。此外,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草拟这样一份全面的报告所作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表明,安理会在过去一年中力争应付广泛的长期和新的冲突,这些冲突尤其对平民的悲惨影响以及规模和复杂性,极度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

报告表明安全理事会及时、持续和公正地处理冲突的能力甚至是其意愿,都受到严峻的考验。秘书长在其对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的这种缺陷,足以反映出我们在调和普遍合法性的需要与有效捍卫人权需要方面的无能为力。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鉴于我们过去尤其在非洲的如安哥拉、卢旺达和索马里等地的集体失败的记录,过去一年中的一些事件会使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预期看到更坏的情况。

但同时联合国却继续它扩大其工作的透明度的努力,方法除其他外还包括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举行更公开的会议。我们相信这些步骤是安理会对同联合国更广泛的会员国就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问题保持持续和透明的对话的重要性的认识。

然而,要使这一趋势具有意义,安理会将需要超越在公开辩论中仅集中讨论主题问题的作法——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倾向于集中注意解决具体冲突、更重要的是解决潜在冲突的实际方法的定期和公开的讨论。

简言之,安理会需要定期与会员国协商。另外的持续“一切照旧”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在这方面,安理会在过去一年中似乎无法连贯处理冲突问题的很多情况,使我们难有信心。我想到的是很多成为安理会处理各种问题的办法的特点的争议之处,例如科索沃、利比亚的制裁、伊拉克问题的僵局、陷

入东帝汶的暴力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和周围的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等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会员国再次倾向于合理地质疑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意义和能力、以及其目前的组成和权力分配的不合逻辑和家長制的性质。

姆贝基总统在上月对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些关注,他当时说:

“联合国需要……防止敌对行动的暴发,因此联合国就有义务让政府和人民看到,它是一个真正不偏不倚的调解和调和者”(A/54/PV.4,第 7 页)

然而,我高兴地表示最近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伴随科索沃和东帝汶的积极事态发展和成果而来的,是进一步令人鼓舞的迹象,即安全理事会可能打算以必要程度的注意力和决心,加之适当的权限而处理特别是非洲的其他冲突,这最近在处理科索沃和东帝汶问题中证实是极为关键的。

安理会的这种积极的新趋势,如果得以从言辞进展到行动,本身就是对非洲及其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同样决心的建设性和适当的反应,这一决心即通过解决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的冲突的区域干预而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并非不合理的要求,不过是联合国集体支持这些当地的努力,在适当的时机并按该大陆的情况而定,来采取适当和有意义的行动。尤其重要的是,该区域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真诚努力,从此应得到安全理事会适当权限的支持。

南非相信,在今后的几天、几星期和几个月内,非洲大陆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这种浮现出来的新的对话将证明是可持续的,并将证明是实现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持久和平以及该大陆仍在处理的其他冲突的关键。

我们作为非洲人正努力确保在寻求解决非洲区域冲突的因地制宜的办法的同时,还要在当地采取行动以加强各种国家和区域体制的民主特点、尊重人权的文化以及相关的更好管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政策的方面。

我们还殷切希望,如果一种新的合作与责任制的精神成为安全理事会目前与各会员国之间互动的特点,那

么同样这种精神就将体现在明年关于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改革的辩论中。

我们今后在防止和结束冲突中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会员国的集体意志和行动,尤其是取决于恰当地代表会员国的安全理事会。

正如姆贝基总统指出,将需要“道德和智慧勇气”来迎接挑战。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个审议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涉及 1998 年 6 月 16 日至 1999 年 6 月 15 日期间的报告的机会。我们对安理会本月主席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出色地介绍本报告表示感谢。

这个年度报告反应了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广泛活动。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世界社会越来越经常地寻求联合国的帮助来解决问题。挪威欢迎这种情况。集体国际安全取决于会员国致力于多边合作,取决于它们对安全理事会的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首要责任的尊重。

而同时,大会也抱有希望充分了解安理会活动的合法愿望。年度报告应包括尽可能多的反应情况的资料。挪威赞赏为使这个报告对所有会员国来说更容易读和更有用而作出的努力。我们将鼓励安理会继续作出这方面的努力。

必须尊重《宪章》中所规定的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分工。不应做任何可能削弱安理会有效率的执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能力。同时,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与大会所负责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秘书长尖锐地强调了联合国的和平与发展努力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联合国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的必须性。

大会对减轻贫困、发展援助、建立和平、人权和环境等关键领域负责。这些领域对了解和处理冲突的根源极其重要。因此,挪威强调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作法,这需要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密切合作。

挪威一贯强调加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中确保取得了进展。我们欢迎以下事实:已确立了向非成员提供资料的正规的和非正式的作法。挪威赞赏就安理会议程上的重要问题举行公开定向辩论的做法。这种辩论应该确保安理会在审议中考虑到联合国所有会员的看法。

挪威想重申它对以下意见的支持:安理会应作为公开会议,而不是作为全体磋商来组织那些基本上是通报性的会议——例如秘书处或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情况通报会。当然,这并不排除安理会在这种情况通过会后就所涉问题举行非公开磋商的可能性。

在涉及维持和平行动时,由于这种行动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以外的很多国家的部队和人员的参与,所以透明度和开放性是特别重要的。所有部队派遣国,包括那些其平民人口参与多职能行动的国家的意见在讨论这种行动时应该得到征求,这些国家的这种愿望也是合理的。在审议维持和平行动任务之前,所有可能的部队派遣国都应有机会表达它们的意见。挪威赞赏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机制。充分利用这种机制是安理会所有成员和部队派遣国的责任。

在最近几年中,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成为联合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在巴尔干地区,联合国正在与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联盟这样的组织共同工作以恢复工作与稳定。作为欧安组织今年的当职主席,挪威谋求与联合国系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与参与欧安组织地区的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立和平活动的各种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分区域机构作为合作伙伴起了关键作用,补充了联合国为和平与发展作出的努力。挪威对在非洲的冲突管理和发展合作方面与这些组织和国家政府密切合作感到自豪。极其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充分参与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从而促进在几个领域中看到的进展。

安全理事会继续处于国际社会为世界各国寻求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中心。这是应该的。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时,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安理会的强有力的权威得到保持。当然,安全理事会可以指望得到挪威的充分承诺和支持。

内贾德·侯赛尼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让我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10 月份主席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向大会介绍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全体会员有机会讨论和审查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授予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联合国机构,安全理事会发挥着直接影响所有会员国利益的关键作用。

大会现在审议安理会的报告不仅是象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引言中所强调的那样是根据《宪章》第十五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四条第 3 款,而且是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 1 款。该款决定,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不是安理会的固有权利,而是全体会员国授予它的责任;该款在 54 年前普遍存在的气氛中说,会员国同意,安理会在履行属于此责任下的职责时,是代表会员国行事。

因此,作为大会的一个成员,我们特别重视这个议程项目,因为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都想知道安全理事会正在以它们的名义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和以何种方式这样做。不幸的是,文件 A/54/2 所载的这份涉及 1998 年 6 月 16 日至 1999 年 6 月 15 日的 476 页的报告,只告诉我们安全理事会做了什么事,几乎没有分析和处理所得到的教训,尽管只是希望对这了解更多的广大会员国发出多次呼吁。

报告仍然主要是各种文件的汇编。它需要载有关于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全体非正式协商的情况。它不仅应包含每次非正式协商的日期和议题,而且还应包括对讨论的简要陈述。

安理会成员之间关于对全球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有时对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产生十分直接和实质的影响。这些协商通常构成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声明的基础,而更广泛的会员国却对此尽力甚少。当然,我们意识到安全理事会决策的迅速,有效以及有时保密的需要。然而,这些考虑并不是十分狭隘地解释《宪章》第 31 条的理由,据此把有关会员国排除在促进安理会决策进程之外,更有甚者,不准它们得到有关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方案和执行进程的及时和有意义的信息。

这并不是否定安理会在过去几年中采取了一些行动使其工作方法和报告更加透明和翔实的事实。我们欢迎并鼓励这些努力,但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够的。

我们乐意看到安理会轮换主席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大多数每月评估被列入报告。这些评估以十分有益的方式补充了该报告。我们希望所有每月的主席评估继续逐步发展,更少地依靠陈述而更多依靠对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概念性和分析性评估。

安理会主席在每次非正式会议后为非安理会成员的国家举行非正式的情况简介,是一项值得赞扬的措施。我们认为,这一积极的步骤如果要有某种结构和统

一性,就可予以加强并变得更加有益。目前,似乎有一种恶性循环。会员国代表出席人数不多的情况,抑制安全理事会主席乐于做情况简介,但另一方面,当安全理事会主席或其代表不乐于提供或提供情况不多时,则会员国代表也失去了兴趣。我国代表团谨重申过去两年在有关该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非正式情况简介应以同一天或第二天的新闻发布的形式发表,并在安理会年度报告中做出相互参照。

两年以前的 1997 年 10 月 29 日,我国代表团在大会审议该项目时,提出了关于涉及军事参谋委员会工作的问题。我谨指出,在今天的报告中,有 26 行专门谈到军事参谋委员会的工作,与前两年的报告相比,表现出 600% 的增加。我认为这是正确方向上的第一个良好步骤。

安全理事会去年面临着很大程度的动荡。科索沃的人间悲剧在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给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次考验。认为甚至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安理会的表现不甚满意恐怕不会离题太远,更不用说联合国的广大会员国,他们总体认为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宪章》第 7 章规定的职责,相反去把这一职责交给了一个区域军事联盟。这应当唤醒我们所有人:如果不使安全理事会更新和民主化,那么《宪章》中的集体安全概念今后就必将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破坏,安全理事会就将无法履行各会员国最初赋予它的职责。

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合时宜及不民主的否决做法。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去年尤其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经验由于对安理会权威的信誉的根本影响,需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 15 条而向大会提出特别报告。该报告应回顾安理会面对的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僵局和原因,以及安理会如何在今后预期解决类似的局势。我国代表团对否决问题的立场,已在不结盟运动的立场中得到阐述,它正在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中得到审议。

另一个与安理会在科索沃的经验有关的、并在秘书长的讲话中享有显著位置的重要问题,就是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在流血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出现的,国际社会无法而且绝不能继续对此漠不关心,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由于国家主权仍然构成基于法律的国际关系的基石,则必须小心不要在无法符合真正的审议进程及各国无法充分促进进程的完善的气氛中审议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

辛维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允许我及我国代表团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介绍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我们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孟加拉国、牙买加、马里、突尼斯和乌克兰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由大会根据《宪章》第 23 条所确定的标准而选出的非常任理事国,帮助使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并使对具有各种缺欠的制度更完美一些。

《宪章》明确表明,安全理事会是负有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维持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因此,《宪章》第二十四条第 3 款和第十五条要求安全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并要求大会接受和审议这些报告。虽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给予其会员国首要地位的《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但安理会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供其审议的作法建立了安全理事会向大会负责的立宪关系。

必须在安全理事会的构成、大会对所有非常任成员的选举、《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代表所有会员国行事、以及以提交报告和大会审议的形式对负责制所作的重大解释等范畴内,看待赋予这项主要责任的职能。安理会的报告就象起联接和接合作用的连字符,把安全理事会同大会束缚在一起。对这个不可分割的联合国工具所作的分析表明,安全理事会这项主要和倒数第二项责任是同大会审议其报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在行使这项主要责任时严格遵守《宪章》所体现的授权,对大会的评论和讨论及时作出回应并作到程序上透明。只要忠实遵守这些准则,就能确保和巩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健康立宪关系。

大会在其 1996 年第 51/193 号决议中概述了这些准则,通过这项决议是为了改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程序。报告在该决议中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其报告中特别列入它在就其负责的问题采取行动或进行审议以前进行全体磋商的情况和导致这种行动的过程;并着重表明安理会在其决策过程中顾及有关属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的问题的大会决议的程度;并进一步加强报告中关于安理会为改善其工作方法所采取步骤的章节。

目前审议的安理会报告虽然作了一些值得欢迎的修改,但仍未充分遵守 1996 年第 51/193 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因此,根据《宪章》大会必须对该报告进行审议,但大会却被置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大会审议报告不

是一项空洞的礼仪,因此,我们重申进一步改进报告程序的理念和迫切需要。

安全理事会诉请主召开非公开会议制度,不是一个难得或偶然的例外,而多少已成为一项惯例,这使得不充分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报告制度问题更为严重。在非常情况下召开非公开会议也许有些道理,但当它形成上瘾习惯而频繁出现时,就违反了作为当今时代主旨的透明度和开放原则。安理会议事规则没有支持这种作法。第48条规定,除非安全理事会另有决定,理事会会议应公开举行。这项规则的明确含意是,除非安全理事会有令人信服的好理由而另有决定外,安理会在一般情况下应举行公开会议。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这种令人信服的理由,但经常不断地背离举行公开会议的准则仍司空见惯。

《宪章》是为世界各国人民宣布的,因此人民有知情权。联合国会员国不论大小都拥有知情权。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阳光,需要新的标准和坦诚的素质,并需要建立一种涵盖权力和责任并使之合法化的新的责任意识。闭门审议然后向全世界宣布正式结论不再是世界致力于建立的开放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序。

人们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讨论和在前几次审议安全理事会报告期间都曾提出这个问题。安理会非成员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过去都曾抱怨安理会工作缺乏透明度。我从去年的审议记录中忆及,代表们都接二连三地强调和同意必须提高透明度。人们同意透明度不仅适用安理会的工作方法,而且也适用其工作的报告和记录方法;而且必须纠正安理会公开会议同更经常地使用非正式全体磋商之间的不平衡。这个问题辩论了很长时间,但尽管今年的辩论再次突出体现这项共识,人们仍没有看到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要补充一点,必须建立透明度的原则不仅适用安理会的审议工作,而且也适用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以便避免发生去年就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运作进行的那种引起分歧的辩论。

除了报告程序和非公开会议的缺陷外,还有一个隐藏更深的缺陷,这是一种致使安全理事会席位丧失道德远见和民主精髓的疾病。由于安理会的构成方式,我们今天遇到了许多问题。安全理事会的结构和构成显然脱离了实际现实,不再能满足国际社会成员的理想和期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全面改革和改组安理会。吸收发展中国家为常任理事国将使安理会更具有代表性、

更加相关并更具有活力。使安理会行动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也将使安理会更有效力。我们将在讨论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时,详尽评论这个问题。改革安全理事会是一项道义要求和实际需要,表明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震惊地发现,在把基本改革构想化为现实方面出现了毫无意义的拖延。危险是,这种改革方面的拖延将削弱该系统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之逐渐被废弃。因此,改革具有其自身的紧迫性。

安全理事会已正确地就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令人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的决议表明了这种关切,这是第一步,也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潜在主导力量。我们祝贺安全理事会决心在各地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赞成安全理事会昨天会议上的共识,即我们决不能被那些正义事业的虚伪论调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所谓政治性的说法所左右。让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将朝着建立一个有效的禁止恐怖主义的全球体制的方向发展,不管恐怖主义采用哪种伪装和借口。

今天,恐怖主义的幽灵困扰和威胁文明本身,危害我们的共同未来。某些国家当作政策工具的有组织恐怖主义和误入歧途的个人及团体进行的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明确和直接的危险。扶植恐怖主义团体和个人、向他们提供保护和避风港,利用他们从事阴谋活动的政府为恐怖主义分子筹资、供资并培训、鼓励、帮助和利用他们。在当代国际中绝对不允许这种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往往很难区别赞助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军队和受人恣意利用的恐怖主义入侵者、渗透者、破坏者和雇佣军。这种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的目的是破坏其他国家和政府的稳定,公然践踏有关主权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国际法的礼节和常规。它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必须表明处理和打击这一问题的政治意愿。为此目的,国际社会现在必须起草一份打击和摧毁恐怖主义的全球公约和全球蓝图,以便利引渡和在各地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

阿富汗在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仍然令人深为担忧。我们同情阿富汗人民,他们深陷一场悲剧性冲突、对抗和危机的痛苦中。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不难发现。在这种强烈的敌意和普遍不信任的气氛中,国际社会应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有关阿富汗的行动,这些行动需要定期、坚持不懈地和坚决的

后续。安全理事会已对阿富汗事件反复表示严重关切,强调需要和平政治解决。但是,塔利班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劝告和法令,今年 7 月又发起新一轮攻势。上星期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267(1999)号决议,让塔利班再次有机会结束它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我们希望和祈祷他们能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减轻阿富汗人民的苦难。不幸的是,我们的希望很难实现。作为一个邻国,印度严重关切阿富汗局势。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给阿富汗问题应有的优先重视。

虽然区域组织可按照《宪章》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作用,但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于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的这一作用已被过去几年的事态削弱、缩小和破坏。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它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区域组织可能没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资源、授权、或真正的国际立场和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下放或者放弃安理会维持和平的责任,只会造成混乱的真空。即使在区域组织拥有这样的军事能力的情况下,它们也缺乏联合国的普遍性,可能只能反映地区的强制力,或者狭隘和有限的做法。因此,它们的行动会显得有派性,除非它们得到安全理事会的直接授权,并在安理会的旗帜下运作。

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的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恰当地指出,

“如果不承认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的基础就会成为疑问。”(A/54/I,第 69 段)

他补充道:

“没有任何其他普遍接受的法律依据可以用来遏制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同上)

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在必要时授权和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权威,修补和重新确定可用来限制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的普遍接受的法律依据。我们不能若无其事的眼看《宪章》和安全理事会被动旁观者的角色,眼看他们的真正作用被架空。

安全理事会的行动需要更加明了、更加公正,更有目的感。它必须让人们看到,它的行动是公平的、一贯的和果断的。例如,安理会主持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方案,安理会成员据此决定批准哪些合同,暂时搁置哪些合同,结果已造成价值 4.5 亿美元的几百项合同被搁置,又没有任何有效和独立的途径来改善局面。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有关非洲问题的辩论,印度参加了这场辩论。过去,早期警报没有得到重视。安全理事会往往不能对非洲危机作出及时的反应,或者不能维持它对非洲的承诺。我们注意到,现在已有一些新倡议。我们将支持和参加在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行动。无可否认,非洲问题需要更加全面的解决,需要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投入和贡献。安全理事会第 1170(1998)号决议已经承认这一点,决议表示希望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能考虑秘书长的报告,采取适当行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一场全力以赴的预防性努力,建设性的多边外交和坚定的发展视角。

在联合国的大多数维持和平努力中,印度自豪地走在部队派遣国的前列。虽然我们赞赏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之间更多和定期的交流,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交流的质量可以改进。应该同主要部队派遣国进行更加充分的协商,特别是在对某一行动的授权作任何改动前。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解决受安理会授权的制裁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虽然该问题已在第六委员会中讨论了若干年,但是还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表现出有力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更大的政治意愿,落实《宪章》第 50 条。50 条的授权是,受安理会对另外一个国家采取的预防性或强制执行措施影响的国家,有权同安理会协商,安理会随后有义务找到公平办法解决该问题。

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在有些国家企图使安全理事会摆脱《宪章》规定的安理会维持和平作用的同时,安理会却表现出在各种其他领域,如人权、裁军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承担主动、积极、有时不那么客观的作用的倾向。这样混淆各不同机关或机构之间作用的区别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混乱和职权范围的冲突。这种情况最好避免。

联合国体现了一种描绘人类把握新的命运的构想。我们需要加强这一构想。我们需要重塑和调整联合国的结构和程序方式,以在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将这一构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赋予联合国以新的动力。我们必须记住,正如古印度的圣贤所解释的那样,和平是一种绚丽夺目的构想。他们指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在人类意识和努力内部和外部追求的和平事业涵盖社会、科学、经济、宗教、政治和生态乃至伦理和精神等各个方面。自由、和平与正义尽管是相互交织在一

起的,但却有一个安全层面,而这个安全层面已被托付给安全理事会,目的是使后代能够免遭战争、暴力和流血的灾祸。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将是二十一世纪实现我们的乐观希望和坚定决心的一个工具。

我们期待安理会适当考虑今天在大会所提出的各项建设性意见,并在工作中、在其处理问题的方法中、在其改组中以及在其下一份报告中反映这些意见。只有在安全理事会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联合国这个人类团结的重大试验和事业才能够取得成功。

彼得雷拉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尤其是透明度的问题,阿根廷有幸与新西兰代表团进行了密切合作,该代表团已向我表示,它赞同我将要说的话。

俄罗斯联邦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向大会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4/2)。我们感谢他以理事会主席的身份所作的发言。

我们对提高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透明度的承诺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想重申,我们随时愿意与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所有会员国进行对话,以便继续朝着这一目标取得进展。这对于本组织的改革进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安全理事会程序方面的最近发展中使主席处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主席负责每天向联合国其他会员和新闻媒介作简报。主席还负责报告增编所载每月评价的格式和内容。此外,安全理事会主席有责任会见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代表。将这些责任交给主席的做法更好地保障了透明度,因为负责提供情况的人已经确认。

今年 9 月 23 日,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与秘书长举行会议后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申明,扼制其否决权的任何企图都不利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进程。然而,现在必须认识到,常任理事国所理解的否决权的行使是与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不相符的。如果这一点得不到真正的理解,那么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努力将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报告显示,在审查所涉期间,部队派遣国举行了 50 多次会议。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使会议制度化的主动行动已取得的良好结果。自 1994 年以来,这一进程在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国代表团带头下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希望,1994 年 5 月 3 日和 11 月 4 日以及 1996 年 3 月 28 日的主席声明中所阐述的这一做法将继续使那些为执

行安全理事会任务而提供人员的国家获益。我们不赞成以所谓出席情况不佳为由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会议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部队派遣国有机会表达它们的关切。对于一些人基于同样理由针对为安全理事会非成员国举行简报会所提出的批评,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

从报告的开头几段就可以看出,安理会的工作有三分之二是在所谓非正式磋商中进行的。安理会非成员仍然不能参加这些磋商。然而,没有理由永久剥夺这些国家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参加非正式磋商的权利。文件编制和程序问题工作组今年广泛辩论了那些由于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一个问题得到讨论而其利益受到影响的国家参加磋商的权利。该工作组的报告仍未得到安全理事会的通过,因为有些成员不同意认为起码应明确说明没有就非成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非正式磋商的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曾若干次强调阿根廷确认此类磋商的作用。我们认为,它们的重要性和频繁程度说明应该确立其程序规则,以便确保其适当运作。

非公开的正式会议,例如下个星期将要举行的听取秘书长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别代表雅克·克莱因先生汇报情况的会议,能够成为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国家进行参与的有效机制。另一个有效机制是举行有记录而且有新闻媒介出席的正式公开会议,就象那次我们听取赞比亚奇卢巴总统的发言,而他也听取我们意见的会议。

我们重申我们不愿意采取其他形式的办法来进行安全理事会与政府代表之间的联系。正如阿里亚大使和包括我国在内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在若干场合所解释的那样,“阿里亚办法”不是这方面的一个适当办法。这个办法是使安理会与那些其活动可能涉及议程项目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完全非正式而且也无记录的接触的一种有益的新办法。该办法被用于听取会员国外交部长和其他部长的意见这一事实并不反映阿里亚大使所确定的办法的意图和精神。它说明安理会没能在其议事规则范围内制订出对话的机制。

对其他会员国开放的会议是可用于秘书长、其代表以及秘书处的其他高级官员介绍情况的另一个论坛。我们已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做法:这种口头情况介绍将不再在非安理会成员国不得参与的非正式磋商中进行。

大会的影响已经产生成果。我们应该记得,安理会是在大会通过第 51/193 号决议之后才通过了对该报告的改进内容。我们将逐步成功地改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式并使它们符合民主的原则。我们感到乐观,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

我们赞扬那些为执行安全理事会所交付的活动而牺牲或受伤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记住这些悲惨事件并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在将来防止发生这种事件。常务副秘书长路易斯·弗雷谢特女士于 10 月 14 日在大会所作的评论很有说服力,应该对此作出反应。

最后,我们祝贺孟加拉国、牙买加、马里、突尼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当选为今后两年的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我们欢迎它们进入安理会。

姆拉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我愿意与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感谢 1999 年 10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俄罗斯联邦的常驻代表对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所作的介绍。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极为重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而年度报告是使更广泛的会员国不断了解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及其决定的一个有益的机制。《联合国宪章》在第十五条中规定,大会应收受并审查安全理事会所送之常年及特别报告。这一规定在大会这个唯一由所有会员国构成的机构和代表我们各国行事的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起了最重要的联系。

尽管这两个主要机构被赋予了不同和特定的任务,但每一个机构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为所有会员国的利益服务。该报告作为使非成员国不断了解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一项有益工具,必须反映审议安理会议程上各种问题所处的客观背景。因此,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报告,包括本报告,在近几年来所逐步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

关于我们正在审议的报告,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本报告的一个新的部分,它载有制裁委员会的各项报告。安理会附属机构的工作范围有所扩大是一个受欢迎的步骤。我们同样高兴地注意到继续列入由安全理事会的历任主席所编写的月度评价。我们继续认为这些评价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就安理会议程上的许多问题通过重要决议时所考虑的问题。虽然这些评价是自愿性的,而且并不一定就反映整个安全理事会的看法,但它们颇有助益和颇具价值地使我们深入理解了安理会的重要决定在其中受到广泛审议的非正式磋商,从而有效地补充了该报告。今年的报告中列入了安全理事会主

席在安理会全体磋商之后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这增添了这些评价的价值。我们赞同这些评价应成为必要内容的看法。我们同时敦促安全理事会主席维持这种积极的做法。

虽然我们仍坚持这一报告的某些方面仍有待改进的看法,但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在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方面所作的改进是实现安理会工作更大透明度方面迈出的重要步骤。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于象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生死攸关问题的机构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我们强烈地感到,国际社会有权通过所有可行的机制充分了解安理会正在以它的名义做些什么。

在这一方面,我们愿重申我国代表团在大会上一届会议上就同一个议程项目所表示的看法:安全理事会应就某些重要的问题向大会提交特别报告。当安理会决定审议和审查改进安理会文件编制和程序的方法,包括提供《宪章》第二十四条第 3 段所要求的特别报告时,我们感到振奋。我们希望鼓励安理会继这一重要决定之后采取将增加安全理事会工作透明度的具体行动。我们认为,当前实现更大透明度和公开性的努力必须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为此目的确立的机制和惯例。我们认为这些努力不仅将增加安理会的效率和效力,还会提高其信誉。

在审议安理会报告的过程中,我国代表团愿就安理会工作的一些方面发表一些看法。正如众多的业已举行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和业已通过的决议所显示的那样,过去一年安理会议程繁重,事务繁忙。目睹世界某些区域的事态发展令我们感到极为不安,它们不仅考验了安理会的效力,而且还考验了其信誉。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安理会被搁置在一边,未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同样令人有些不安的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种通过区域组织的机制寻求解决巴尔干正在出现的危机的独特模式。尽管我们充分意识到某些区域组织过去几年的成就及其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日趋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执行和平领域的积极作用,但我们认为:如欲有效地维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边体系的话,区域组织的行动就必须有明确授权,而且不得绕过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不应受到任何削弱。否则的话,无论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从法律上或从政治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安理会除危机局势外,还辩论了其他问题,例如儿童和武装冲突以及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问题等等。将审议这些问题作为安理会工作的一

部分是一个健康的趋势,应当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这些专题性辩论将增强安理会处理其议程上危机的复杂根源的能力。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辩论最近已成为安理会议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会员国积极参与了辩论。

我希望特别提到关于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辩论。恐怖主义行动一般是不分对象的,因此,不仅威胁到作为特定目标的人员的生命,而且威胁到无辜者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懦夫行为已成为对和平与安全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安理会通过第 1189(1998)号决议是一个正确的步骤。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安理会通过该决议表明,它决心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只有通过各国之间合作,才能就防止恐怖主义行动采取有效和切实的措施。

我们确实意识到主题性辩论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辩论有助于安理会的工作。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辩论应当令安理会转向《宪章》不曾为它设想的问题领域。在这一方面,《宪章》的规定非常清楚。第 24 条授权安理会承担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并申明“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次项职务时,应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履行其主要职责时,不可超越《宪章》为其规定的权限,并将继续把注意力放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

此外,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尤其是那些导致使用武力或含有军事因素的措施,应符合国际法原则,并考虑到尊重主权的原则。同时至关重要是,含有军事因素的措施不应成为对全然属于各国内部管辖权的事务的随意干涉。

大会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其与安全理事会的联系,我要特别提到大会第 47/233 和 48/264 号决议,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第 51/193 号决议。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作为回应,采取了许多有益的措施。如此以来,两个机构之间为加强联合国而展开的相互作用得到了推动,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经改进的格式和内容以及向大会的及时提交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相互作用的势头不应减弱。我们希望通过两个机构的这些努力,安理会作为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行事的机构,将更具透明度、开放性和责任感。

弗兰切塞先生(意大利)(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今晚在你主持会议时在大会上发言。

(以英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向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表示祝贺,他清楚、准确和详尽地向大会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我还要祝贺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在编写这份文件时做了出色的工作。此外,我国代表团衷心赞赏安全理事会成员,他们所有人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但今天尤其应当向新近当选的 2000 年和 2001 年的理事国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意大利相信,孟加拉国、牙买加、马里、突尼斯和乌克兰将为联合国这一最高机构增添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并使之更具代表性,而这一机构将从其成员的频繁和定期轮换中获取极大好处。

意大利一再强调,大会对安全理事会报告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这将确保安理会与大会之间按照《宪章》第 15 条规定进行有效协调和相互作用。为做到这一点,报告应对安理会所做实际工作进行分析性的、深入的和切实的描述。近年来在许多方面已经这样做了,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去做。

去年在同一场合,意大利赞扬了报告格式的改进,例如纳入第五部分,说明制裁委员会以及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刑事法庭等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的工作。今年,我必须对文件良好的整体结构表示赞赏,应当承认,由于附上了制裁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这一结构得到了改进。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安理会几乎作为一种统一惯例,在每位主席任期届满时分发一份关于安理会工作的文件,至关重要的 1999 年 5 月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然而,我们希望报告将载有对安理会活动范围内的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切实评价,而不仅仅是描述性地列举各项决定、声明和决议。

例如,去年我们已经建议,为改进报告,应当提供关于部队派遣国会议的更为详尽的信息。总之,虽然报告作为一项有益的参考,当然有益于我们的工作,因此应当得到赞扬,但很难说它向大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手段,可用于评估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为进行这种评估,大会不仅需要安理会的决定和决议的附本,而且需要对导致通过这些决定和决议的进程作出实质性的描述。报告应当总结安理会关于飞机领域、区域紧张局势、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问题,包括人类安全以及区域和全球稳定等的辩论情况。我们不仅应得到已批准的决议的案文而且还应获得导致通过一些决议或否定另一些决议的决策进程的有关信息。人人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做了些什么。但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有那些事情没有做。缺乏

这类信息,我们就无法知道安理会是否显示了全部潜力,或只是竭力掩饰其内部的分歧。

在讨论报告时,我们不得不再次关注透明度问题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确认联合国会员国

“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会员国赞成《宪章》及其规定,但没有放弃本身处理世界安全的作用。出于权宜之计和紧迫性,它们只是将确定正在出现的威胁和采取迅速行动制止威胁的主要任务委托给安理会,安理会永远是代表联合国会员国行事。

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一项总原则,安全理事会开会应该是正式的公开会议。此外,秘书长和秘书处其他高级代表作通报和提出报告原则上都应在所有会员国都能参加的会议上进行。我们对报告所涉期间正式会议次数比前 12 个月有所增加表示赞赏。但仍需采取措施确保这些会议不仅仅用于形式上批准文件或辩论重要但并非那么紧迫的问题。170 多个国家只是在安理会举行讨论后才得知举行了讨论,而且常常是时不时、不完全地从各代表团之间的第 2 手消息中得知举行了讨论。

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共同的利益,不是任何一个会员国的专有财产,也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专有财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都应对委托给它们的主要问题负责。一种更具分析性、更全面的报告形式才能更好地促进这种责任制,除其他外,能够让会员国真正评估安理会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秘书长的报告涉及 1998 年 6 月到 1999 年 6 月,在这一期间出现了许许多多国际社会认为必须作出反应的危机。我要指出,尽管安全理事会必须尽最大努力处理所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论这些威胁发生在何处,但同样,非洲及该大陆各个地区冲突才是对联合国有效性的真正考验。我们坚信,在非洲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应该加强政治敏感性和行动的决心。过去的经验应该指导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从过去几个月可以看出,科索沃事件表明安理会成员不团结使联合国在一场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一开

始就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兰贝托·迪尼外长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一开始的发言中指出的:

“交叉使用否决权造成僵局和瘫痪必须避免,其办法是使那怕最强大的国家恪守一整套行为规则和政治——如果不是法律的——原则”。(A/54/PV.8)

意大利继续坚定致力于在过去几年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安全理事会。过去的经验表明,安理会迅速有效处理国际危机的能力本身受到否决权或仅仅威胁使用否决权的制约。

我们都承认,为应付有关其机构责任的多方面的新挑战,联合国需要调整。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重要的因素。安理会需要更有代表性、民主和透明度。所有区域集团及其成员都应感到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活动充分反映它们的实际情况。每一会员国都应该确知安理会会随时负责并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一点极其重要,这是无需强调的。这是确保联合国有办法、手段和政治意志实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目标的主要途径。

下午 6 时 25 分散会